

学术翻译与中国媒介环境学的发展 ——何道宽教授访谈录

宋晓舟 林大津

摘要

本文通过访谈方式，对比原著和译著的被引率，追溯何道宽翻译的学科渊源、翻译过程和译作选题，以求揭示何译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贡献，同时探讨何译特点以及译有所为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及其对外语专业学科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

传播学、媒介环境学、译著、何道宽

作者简介

宋晓舟，福建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跨文化交际学和翻译学，电邮：fjtdlaura@163.com。

林大津，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修辞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跨文化交际学和修辞学，电邮：ldj@fli.com.cn。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批准号：13JJD750016）“台海两岸跨文化交际比较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Contributions of Academic Trans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Studies in China: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e Daokuan

SONG Xiaozhou, LIN Dajin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email interviews, zooms in on the translation works by He Daokuan, aiming to reveal the contributions of He's transl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ticeably to that of media ecology, in China. Explorations are mad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original major field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his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his research shifts based on his translation works. With the citation ratio of his translations and that of their original English works compared and analyzed, he's contributions are clarified, and broader

implications are suggeste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in China.

Keywords

He Daoku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Media Ecology, Translation Works

Authors

Song Xiaozhou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urrently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focuses a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in Dajin is a professor and a Ph.D supervisor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with his doctoral degree in rhetoric. His research focus a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ldj@fjli.com.cn.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 of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Project No.: 13JJD750016).

对谈人：宋晓舟、林大津与何道宽

统稿：宋晓舟

2013年10月深圳大学举办“何道宽教授从事教学科研与翻译工作50周年”高端论坛。外语界跨文化交际学发展史研究者对何道宽（1983a, 1983b）引介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首创之作了如指掌，对何道宽（1995）与外语界同仁创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并当选为副会长也不陌生，但随着时间推移，何道宽以其巨量译著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影响更广。2年多来，林大津与其指导的博士生宋晓舟通过电子邮件不断采访何道宽教授，将“何道宽现象”首先置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领域思考，继而从中挖掘外语界学人的治学之道。

外语界学人的跨学科情缘

林：何老师好。外语界学人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有所思考。翻译的历史作用无需赘述，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离不开外文论著汉译。然而，由于我国译界对应用文体¹翻译（史）长期缺乏研究，加上其中有些翻译家在各自专业领域独树一帜，其专业声誉盖过其翻译事业上的辉煌，以至在过往翻译史中难寻踪影或着墨不多（方梦之、庄智象，2016）。因此，我们想就您的新闻传播学译著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独特贡献，进行一番梳理。

宋：是的，与其像国内翻译界有些人抱怨翻译地位低不受重视²，还不如实实在在地挖掘当代翻译家与人文社科发展的相关性。于是两年多来，您作为资深翻译家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关系成为我撰写博士论文的课题。

何：我们知道，1949年之前，大陆高等学府中“新闻传播”类专业不能说一无所有，只是此后这些新闻传播类系科移往台湾高校。改革开放后，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蓬勃发展，传播学院系纷纷建立。此间，我做了一点引进工作，容我罗列一些数字：数十年来我出版译著70余部，其中新闻传播学译著居多，已发表相关论文40多篇，两者相加逾1800万字。

林：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时任所长李瞻（1982：3）回顾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自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民国九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创报学系，迄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但其效果，仍未达到成熟丰收的阶段。”这一回溯与何老师的回顾不谋而合，也说明20世纪初虽然大陆已经涉猎新闻传播，但研究效果不彰。其实，海峡两岸的新闻传播学发展，如同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一样，都带有“舶来品”性质，都离不开外文汉译的贡献。

宋：是的，历史存在、发展轨迹与当代状况的时空链接的确需要一番梳理。何老师您的新闻传播学译著，尤其是媒介环境学的众多译著，对中国当代传播学研究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助推作用。您在退休后，每年都推出约100万字的译著，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您传播学领域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比如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就说过：“何道宽教授的译著已对中国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将具有长期的效用，他为培育我国新兴的传播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何道宽，2013a：封底）我想，探究您的相关系列译著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关系，特别是聚焦媒介环境学，可以让译者“现身”，可为译者与学科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鲜活的例证，对于新闻传播学界和外语界学人都有启发和裨益。

何：你们两位首先在文献搜索方面下了苦工。林老师刚才提及台湾李瞻教授的回顾是在1982年。这一时间节点与传播学在大陆的发展相当吻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播学正式开始其“西学东渐”之旅，西方传播学著作从这个时期开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文芳，2011），其中译著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资料来源，在过去的30年来中，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著作中，译著占出版总量的18%（王怡红、胡翼青，2010：794）。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我的翻译虽然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新时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但却是几经周折，不敢说“后来者居上”，但绝对不是先行者，因为我的学科背景毕竟是英语专业。

从跨文化交际到跨文化传播：开启传播学翻译的艰难之旅

林：记得1995年北外胡文仲教授和哈工大贾玉新教授等与我们一起创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深圳大学1999年承办了中国第三届跨文化交际年会。此后，我发现您比较少出席外语界的这一年会，源源而来的消息却是您一部又一部新闻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您是如何与新闻传播学结下不解之缘，如此多产的学科根底应是我们外语界学人特别值得深究的课题。

宋：译者的个人特点、个人经历与社会背景是其翻译选题的重要原因（孙瑜，2013）。能否就此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新闻传播学翻译之路的。

何：回顾个人经历，“读书”是个关键词。少年时代，我先接受传统国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而后进入新制中学。1959年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就读期间几乎读完了图书馆里所有的英文书。1978年入读南京大学英语系，师从陈嘉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受益终身。1980年赴美访学，“葬身”图书馆，一年之后海运四百余册书籍回国。在美期间，发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居然无法用英文为美国师生介绍老子哲学，这对我震撼极大。80年代是我疯狂读书和购书的十年，我阅读了大量人文社科各类书籍和中国经典古籍，并呼吁外语界师生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学习。

宋：外语界学人记得您于1983年率先在《外国语文教学》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何道宽，1983a），同年在《读书》发表了“比较文化我见”，将这一学科称为“跨越文化的交际”（何道宽，1983b）。梳理中国大陆跨文化交际学或跨文化传播学发展史，我们发现这两篇文章具有开拓之功。随后您翻译了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此后还翻译了《文化对话》和《菊与刀》，成为中国大陆跨文化传播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之一。您在《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的译者序中说过：“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学科本是同根生，只不过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野，而我是两者之间的‘边际人’。”（何道宽，2013b：11）是否可以说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成为您进入传播学界的桥梁？后来您的翻译选题如何锁定媒介环境学这一新方向呢？

何：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确实是我从外语界跨越到传播界的一座桥梁，不过还与我1993年转调深圳大学任教有一定关系。深圳大学尤其重视传播学研究，重视跨学科交叉研究，比如1997年深圳大学实行学院制，中国文化与传播系和外语系合并为文学院。1999年，第三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国际研讨会在深圳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有来自新闻传播界、外语界和文化界的各位同仁，我开始关注传播学界

的发展。2001年我第一次参加传播学年会，结识了人大出版社的司马兰译审和现在传播学界译介领军人物展江博士。2000年，国内学术译著市场开始复苏，在这一环境下我正式加入新闻传播学队伍。从2000年开始，我有计划、大规模地引进传播学经典，有意识地抢占学术译著的制高点，计划攻克的“墙头堡”就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的著作（何道宽，2013b：10）。2005年，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我兼任研究员。从那时起我们就准备将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流派作为一个整体引入国内。

宋：我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发现您所说的“媒介环境学”的英文术语是media ecology，外语界近年流行“生态翻译学”，其中“生态”来自英语ecology，它的常见义是“生态学”，不知为何您将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环境学”？

何：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是由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首创的，但首次公开使用这一术语的则是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70年，在麦克卢汉建议下，他在纽约大学创建了media ecology专业及博士点。国内的确曾将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但国内学者所研究的“媒介生态学”与西方的media ecology的研究重点并不相同，属于误译，所以2006年我和另两位学者达成共识，将之译为“媒介环境学”，它与西方新闻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足而三。

林：这说明您是“不打无准备之战”的，翻译与研究并重，译文质量如何留给读者去评判，作为译者，您首先尽到了理解在先、下笔在后的学术之责，这大概就是翻译界所探究的翻译伦理。

宋：何老师您的人文社科译作近80种，您是如何做到高产优质的？

何：看见学术翻译中“劣币”冲击“良币”，毒害读者，非常痛心，我决心用“良币”冲击“劣币”、淘汰“劣币”。抢占引进版学术著作制高点是上策，用新版译作抵充、驱逐劣质旧版译作也是着力点。

宋：记得您曾提出译者的五个“对得起”，这肯定是有感而发，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何：2006年，我为花城出版社翻译赫伊津哈《游戏的人》，看见旧译本非常失望，有节制地写下这样一段话：“（1）学术著作的翻译，决不能搞大兵团的流水线生产，最好由一个人完成；（2）如果译者没有学术背景的准备，惟一可取的态度是‘以勤补拙’。（3）译者的态度应该是‘三负责’：为作者、读者和译者本人负责，否则译作经不起时间的考验。”2016年，花城出版社决定再版这本书，并

将其放进“赫伊津哈经典文丛”，我又在后记里进一步发挥，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许多译作的后记里、在媒体的访谈中，我反复重申这一庄重的承诺，并进一步提出五个‘对得起’：译者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对得起出版社、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后世，以期把经典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传诸后世。”

林：除了新闻传播学和其它几个人文社科译丛外，能否先简要介绍下您学术翻译的若干精彩时刻？

何：三个巅峰记忆深刻：1）1986年10月底，我应邀为中国文化书院（Academy of Chinese Culture）举办的“文化与未来”研究班担任口译，地点在北大讲演厅。外国讲演人之一是加拿大未来研究会的秘书长弗兰克·费瑟（Frank Feather），其讲题是“Future of Culture and Hi-tech”但重点放在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上。由于热爱并熟悉麦克卢汉，那场翻译酣畅淋漓，台下的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反响热烈，不少人上台恭喜我，称赞“棒极了”；2）2011底，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我“资深翻译家”称号；3）深圳大学校庆30周年时为我举办“何道宽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和翻译工作50周年座谈会”，亮点之一是会上展示我转调深大后出版的53本著作和译作。这批书在校庆展览馆展出将近两年，2015年9月转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

媒介环境学视角之一——麦克卢汉系列译著

宋：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2011：24）曾明确指出何老师您是国内译介麦克卢汉第一人，国内传播学界许多学者都是通过您的译著才认识了麦克卢汉，并了解其学术思想。据我调研，迄今您已翻译出版了10本麦克卢汉相关作品，还有4部即将面世，已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就是《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其中缘由是什么？

何：《理解媒介》的问世标志着媒介环境学的正式诞生。撇开麦氏作为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旗手地位，另有一个原因是：“其他的书能看懂，惟独这本书看不懂。”（何道宽，2013a：475）1986年10月底在北大讲演厅所作的那几场口译也成为催化剂。其录音带成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函授教材，我自己也用这个素材给研究生上口译课。1987年，我着手翻译《理解媒介》（1992年出版），潜心研究麦克卢汉，发现他一生涉足多个学术领域，完成了四次学术转向。他不仅是一位媒介理论家，更是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的著作旁征博引，用典艰深，其中包括莎士比亚、艾略特、爱伦·坡、乔伊斯等大文豪经典。

宋：是的，即使我们英语科班出身的读者阅读麦氏原著也是颇为吃力的，读

了您的译著才深切感受到您是知难而上的,“麦克卢汉式”语言是用诗学艺术语言来描绘社会科学的,其中包含大量双关语和自创新词。通过分析1998年-2015年CSSCI中所有传播学刊物的引用文献后,我发现:《理解媒介》汉译本(三个版本)排名第三,被引810次,是被引率最高的传播学译著。虽然现在中国学者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理解媒介》的英语原著被引率却只有82,只有译著被引率的1/10,由此可见您的译著对麦克卢汉思想在中国的推广至关重要。除了翻译麦氏成名作《理解媒介》三个版本,您围绕麦氏研究的译著还很多。麦氏著作和关于他的著作近30种,其中传记和准传记就有四种。您的翻译如何选题?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麦氏研究?

何: 麦克卢汉研究经历了三次热潮和三次飞跃。先说三次研究热潮。由于历史原因,国内学界对第一次热潮浑然不知,此后麦克卢汉热一度衰减。1992年《理解媒介》译著出版时,恰逢国外第二次热潮随着互联网出现而兴起,但当时国内学界仍然没有察觉。通过麦氏研究的译介,2000年左右国内相关研究才形成规模³。2010年左右兴起的第三次热潮以麦克卢汉百年诞辰为标志,与互联网第二代媒介同步推进。我翻译的《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翻译的其它几本麦克卢汉著作是《机器新娘》《麦克卢汉书简》《麦克卢汉如是说》和《麦克卢汉精粹》。翻译选题主要考虑原著的特点和全面性:完成于1951年的《机器新娘》既属于媒介环境学代表作,也是国外研究广告的最早专著,该书标志着麦克卢汉转向通俗文化研究,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作;《麦克卢汉书简》精选了450余封麦氏信笺;《麦克卢汉如是说》收录了麦氏的演讲稿和访谈录;《麦克卢汉精粹》则精选了麦氏文化经典著作片段和“口传”的众多思想。再说三次研究飞跃。我从全球多个麦克卢汉传记版本中挑选出《麦克卢汉传:媒介及信使》和《数字麦克卢汉》来翻译。前者是菲利普·马尔尚(Marchand Philip)的作品,是一本有血有肉的大传,后者出版于1999年,不单纯是传记,而重在梳理麦克卢汉的理论成果,标志着麦克卢汉研究的第一次飞跃。麦克卢汉研究的第二次飞跃是以《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为标志的。第三次飞跃是以罗伯特·洛根(Robert K. Logan)《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的出版为标志,该书是“麦克卢汉思想的权威解读和最新发展”(何道宽,2013a:130),作者挖掘出麦氏的38种研究方法。我力图选取不同角度的论著来翻译,为中国读者全面展示麦克卢汉。尽管如此,目前国内麦氏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目前市面上除了我翻译的几个译本,只零星存在2、3个其它译本,而日本人几乎翻译了他的所有著作。

林：我补充一下：在翻译麦克卢汉经典和麦氏研究经典的同时，何老师还发表了8篇相关研究论文⁴，可以说，通过译介和研究麦克卢汉，何道宽已超越了译者角色，成为国内研究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的专家。如果说麦克卢研究译作还无法充分展现何老师媒介环境学译著的立体画面，那么辅以其他西方媒介环境学巨匠的译著当足以呈现何老师译著之巨及其学术影响之大。

何：2014年，我有幸应邀参与“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撰写工作，负责媒介环境学这一块。在此基础上，我总结提炼十余年来研究媒介环境学的心得，完成《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殿堂》（何道宽，2015a）。这一工作使我能“得陇望蜀”。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后，我不是欲罢不能，而是流连忘返了。

媒介环境学视角之二—莱文森系列译著及其他

林：何老师，恕我打个不太恰切的比方，您似乎不想只呆在高山之巅，而是环顾四周，毫不逊色的译笔也将我们带入美国跨学科奇才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媒体世界。

何：是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有三个世代的代表，分别是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波斯曼和莱文森并非麦氏的嫡系学生，但他们都自认为是麦克卢汉的“私淑”弟子，他们不仅传承麦克卢汉的思想，而且有偏离、反叛和超越。媒介环境学的第二代精神领袖波斯曼戏称自己是麦克卢汉的孩子，但不是那么乖的一位，因为他的思想相对麦氏有所偏离。被称为“后麦克卢汉第一人”的莱文森是波斯曼的博士生，经他介绍与麦克卢汉相识，两人关系极为亲密。然而，做为第三代代表人物的莱文森扬弃并超越了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的理论，提出了媒介进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何道宽，2013a：315）。

宋：莱文森系列是您系列译著的第二大亮点，他的译著在中国您是独家译者，且汉译本的数量超过了任何其他语言译本。除了上文提到的《数字麦克卢汉》外，还包括《思想无羁》《手机》《软利器》《真实空间》和《新新媒介》和《莱文森精粹》等。

何：上面提到的作品加起来一共是9部（含两本再版），因此中国读者也非常熟悉莱文森。《新新媒介》使得莱文森进入最先锋的媒介理论家行列。这里我想强调几点：1）莱文森把《真实空间》作为“神六”献礼；2）《手机》是在中美同步出版的；3）《莱文森精粹》是经我提议并与莱文森合作编辑直接在中国出版的，要知道在世的外国作者能在中国出选集的是凤毛麟角（何道宽，2013a：321）。

宋：这充分说明了这位“新新媒介家”对中国读者的重视，也是莱文森对您译著质量的认可。我们注意到：您的莱文森系列译著，每一本他都写了序言，这可谓莱文森的“中国情节”。除了麦克卢汉和莱文森两位大师外，您的其它媒介环境学系列译著近年来也不断问世，媒介环境学三代学人的作品均有涉及。其中另一位标志性人物是多伦多传播学派双星中的另一位，即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您引进了他的三部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这三部也是媒介环境学奠基之作，在传播、历史与媒介理论的重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您为何给予伊尼斯著作浓墨重彩呢？

何：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同为媒介环境学第一代的杰出代表，两人共事5年，友谊很深。他的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都是麦克卢汉作序，但两位同仁的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极不相同。世人对伊尼斯的怠慢令人扼腕。所幸的是，十年前我引进他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后，国内已经涌现出一批研究和弘扬伊尼斯思想的专著、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最突出的代表是北师大毛峰教授的《文明传播的智慧》（何道宽，2015b：9）。我完成了这三部曲的中英双语对照版，为志趣相投者提供了双语对照的便利。

宋：您还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系列丛书完成了四本译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技术垄断》《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和《媒介环境学》。作者分别为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和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其中第一位是媒介环境学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中间两位是第二代代表人物，而最后一位则属于第三代代表人物。其它相关的传播学译著还包括《互联网的误读》《媒介、社会与世界》和《字母表效应》等。《互联网的误读》从多学科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媒介、社会与世界》聚焦媒介研究和媒介社会学，构建了媒介伦理和媒介正义框架；《字母表效应》则是一本传播史专著，研究了拼音字母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地位。

何：小宋以上概括要言不烦。

林：不可忽略的是，何老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系列丛书完成的四部译著中，《媒介环境学》和《技术垄断》两部还以繁体字在台湾出版，影响力波及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大中华区。

宋：难怪邱林川博士要专访您和冯建三教授⁵，难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展江教授认为您是“中国传播学高水平专著翻译第一人，为引进整个传播学环境学派居功至

高”（何道宽，2013a：封底）。

何译的特点

宋：我们发现，您的译著绝大多数在汉语市场都是独家，但有些译本是在已有他人译本之后的重译。原因何在？

何：那是因为从学术角度看，早期译本出版社和我本人均不甚满意。例如重译《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是因为需要对关键的概念进行修订。《传播学概论》的余也鲁译本经施拉姆同意，采用“译述”，因此过于“活”（free）（何道宽，2013a：378），失去了原著风格；陈亮等三人合译的《传播学概论》，虽然“译者态度严谨，译文应属高水准，但也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何道宽，2013a：378）。面对前期这两种译本，出版社和我才决定重译。不过，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所以我也利用译著再版机会不断改进，希望奉献力所能及的最佳译本，为学术繁荣尽绵薄之力。同时，我希望用所谓“良币”淘汰“劣币”，已如上述。

宋：我还发现您很多译著的书名和其中术语翻译都有自己的标准，比如Speaking into the Air: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中副标题意为“传播观念的历史”，很好理解，但是主标题如果直译成“向空中说话”，前后主副标题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

何：的确如此。少有人知道Speaking into the Air取自《圣经》，意为“毫无意义的徒劳之举”。通过对该词语在《圣经》中的原意考察，我觉得原著作者想表达“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告诉读者：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交流。最后决定将书名译为：“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术语翻译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communication一词，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译成“传播”，而这在很多语境下不是很妥帖的。我在不同译著中根据原著语境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翻译《交流的无奈》时，考虑到communication在英语中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才获得“传播”这个意项，因此将1920年之前出现的communication翻译为“交流”，其它情况都是根据不同语境做不同处理。

林：这的确是一个负责任译者的缜密思索。刘海龙（2014）也专门就communication汉译做过考证索隐，指出20世纪初，communication曾被译为“交通”，是指“交流”与“沟通”的意思。如果我们的目光往前往后考证，翻译过程时代语境的确不可忽略。彼时“交通”与当代“交通”不可同日而语，再往前追

溯到1904年严复出版《英文汉诂》，其中“交通”指今日的“里通外国”⁶。不过 speaking into the air 还有可能是一种文字游戏。我这里不妨先引用《圣经》原文：

“Now,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I come to you speaking in tongues, how will I benefit you unless I speak to you in some revelation or knowledge or prophecy or teaching? It is the same way with lifeless instruments that produce sound, such as the flue or the hap. If they do not give distinct notes, how will anyone know what is being played?” And if the bugle gives an indistinct sound, who will get ready for battle? So with yourselves; if in a tongue you utter speech that is not intelligible, how will anyone know what is being said? For you will be speaking into the air.”（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中说话了。）⁷从《圣经》原文看，的确如同何老师所分析的，“对空说话”无人领会，但 speaking into the air 的字面“形象”恰如广播形式和电视形式，广播冲击听觉，电视既冲击听觉更冲击视觉，均与“空中传播”有关。如果书名翻译一定要将这“一语三指”的游戏进行到底，可否翻译成“对空呼唤——传播思想史”？“呼唤”带有祈求理解的意味，留点空间，留点想象，留点余味。

何：谢谢。重复我刚才说的，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所以利用译著再版机会不断改进是必须的，林老师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宋：我在阅读您的译著时，发现其中除了您翻译的大量注释外，还有大量出自您手笔的译者注。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中，第四章的原注特别多，达18页，译者注也多达49条。麦克卢汉原著一个注释都没有，译著中的注释全部是您的译者注。

何：麦氏用语是个迷宫，所以翻译的局限只能靠译者注来弥补。例如，为了扫清读者阅读障碍，我为《机器新娘》做注释300余条。这是译者的翻译伦理和职业道德，也是对读者负责吧。

“何道宽现象”的跨学科解读

宋：《凤兴集》吴予敏（2013）序二“我看‘何道宽现象’”，主要指2002年您退休后约十年时间，为学术界、出版界、教育界推出大量经典著作译本，外加研

究论文、讲稿、序跋等，共有1600万余字成果。我觉得非常有启发，因为“何道宽现象”给传播学和外语界师生和学者都提供了一个范例。您出身英语专业，但从一位普通译者转化成为一名具有多维身份的译者，我想您一定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和感悟。

何：其实麦克卢汉和霍尔的经历都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麦克卢汉。他虽然在剑桥大学取得的是文学博士学位，但在读期间，他的阅读视野远远超越了文学和哲学，达到了有书就读的地步。除了英语语言文学和传播学外，我这20余年翻译生涯还涉猎了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史、政治学、心理学学科，读了大量的书。而且从读书中，我发现学习各学科的历史是了解人文社科的“捷径”。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人文社会科学是互通的，各民族、各种文化也是相通的。因此我认为，不能做“平面人”，不能做“半个人”，只有这样我才能完成现在的学术兴趣转向。

林：退休之前，您是教研和行政双肩挑；退休之后，您是科研晚霞红满天。何老师您的“盗火”与“播火”是双向的。由于此次访谈宗旨所在，何老师用英语撰写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之作只好略而不赘。根据我们可靠“情报”，2016年，读者将迎来何老师您新译多部，因此“何道宽现象”延续进行中。

何：我的学术翻译得到你们二人的肯定，也得到大中华地区学界和许多外国学者的肯定。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博士为此而专访了台湾政治大学的冯建三教授和我，莱文森等外国学者在其著作的中译版序中留下大量的溢美之词。但我清醒地认识到，译事艰辛、难以登堂入室。我的短板甚多，难以达到完美境界。我的译著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作用微乎其微，但作为外语界学人，你们对于如何重构外语学科的思考是富有建设性的。多谢你们师徒二人的采访。

（责任编辑：陈辉）

注释 [Notes]

1. 翻译界的“应用翻译”主要是相对于“文学翻译”而言的，其涵盖面很广，与“实用翻译”也难区分，后者可以具体到“产品说明书”等，本文特指非文学作品方面的人文社科类翻译。
2. 谢天振在“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理论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一文中指出（《中国翻译》2001年第4期第5页）：“国内翻译界，一方面抱怨翻译地位低，不受重视，但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轻视翻译研究，更轻视翻译理论研究。”
3. 详见何道宽：“麦克卢汉研究的三次热潮和三次飞跃”（《华中学术》2012年第2期，235-242页）。
4. 分别是：1）《麦克卢汉的遗产——超越现代思维定势的后现代思维》（《深圳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2）《媒介革命与学习革命——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

- 第5期); 3)《麦克卢汉在中国》(《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4)《媒介即是文化——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5)《硕果永存——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述评》(《企业与传播》, 香港开益出版社, 2011); 6)《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 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7)《天书能读: 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8)《媒介环境学: 从边缘到庙堂》(《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5. 详见Linchuan Qiu: “Cultural Translator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Greater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10), 1030-1053)。
 6. 详见《严复全集》(卷六)之《英文汉诂》(林大津点校)第84页: “果使必牵于所习而崇拜之, 则西国之卿大夫, 将人人皆犯交通之刑宪。”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7. 原文和译文引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版的英汉对照版《圣经》之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306页, 原文“brothers and sisters”原著中汉译为“弟兄们”, 此处保留原译。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方梦之, 庄智象 (2016). 翻译史研究: 不囿于文学翻译——《中国翻译家研究》前言. 《上海翻译》, (3), 1-8+93.
- [Fang, Mengzhi & Zhuang, Zhixiang (2016).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history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by literary translation--Preface to *Studie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3),1-8+93.]
- 何道宽 (1983a). 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 《外国语文教学》, (2), 70-73.
- [He, Daokuan(1983a). Introducing a new disciplin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2),70-73.]
- 何道宽 (1983b). 比较文化我见. 《读书》, (8), 104-111.
- [He, Daokuan(1983b).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culture studies. *Reading*. (8),104-111.]
- 何道宽 (2012). 麦克卢汉研究的三次热潮和三次飞跃. 《华中学术》, (2), 235-242.
- [He, Daokuan(2012). Three booms and three leaps in the studies on McLuhan. *Central China Academics*,(2),235-242.]
- 何道宽 (2013a). 《凤兴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He, Daokuan(2013a).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He Daoku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何道宽 (2013b). 译者序. 载普罗瑟 (著). 《文化对话: 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85).
- [He, Daokuan(2013b). Preface by the translator. In Michael H. Prosser. *The Cultural Dialogue: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 何道宽 (2015a). 媒介环境学: 从边缘到殿堂. 《新闻与传播研究》, (3), 117-125.

- [He Daokuan(2015a). Media ecology: from border to center.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3,117-125.]
- 何道宽 (2015b). 修订版译者序. 载伊尼斯 (著), 《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1951年).
- [He Daokuan(2015b). Preface by the translator of the revised edition. In Harlod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Trans)*. 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1).]
- 李瞻 (1982). 总序. 载汪琪 (著). 《文化与传播》. 台北: 三民书局.
- [Li Zhan(1982). Preface. In Wang Qi.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aipei: San Min Book Cooperation.]
- 刘海龙 (2014). 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演变及意义. 《新闻与传播研究》, (8), 113-119.
- [Liu Hailong(2014). The evolution and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8,113-119.]
- 孙瑜 (2013). 《<浮士德>汉译者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上海.
- [Sun Yu(2013).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chinese translators of Faust*. PhD Dissertation. Shanghai.]
- 王怡红、胡翼青 (主编) (2010). 《中国传播学30年》.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Wang, Yihong & Hu, Yiqing(eds.)(2010). *Media studies in China: 1978-2008*.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文芳 (2011). 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出版科学》, (6), 55-58.
- [Wen, Fang(2011). A Study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ation of translated works in 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6,55-58.]
- 吴予敏 (2013). 序二. 载何道宽 (著). 《夙兴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Wu, Yumin(2013). Second preface. In He Daokuan.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lected works of He Daoku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郁龙余 (2011). 山高水长: 记何道宽先生. 《深大通讯》, (1), 24.
- [Yu, Longyu(2011). A portrait of He Daokuan. *Correspondence of Shenzhen University*, 1,24.]